

书面采访

Di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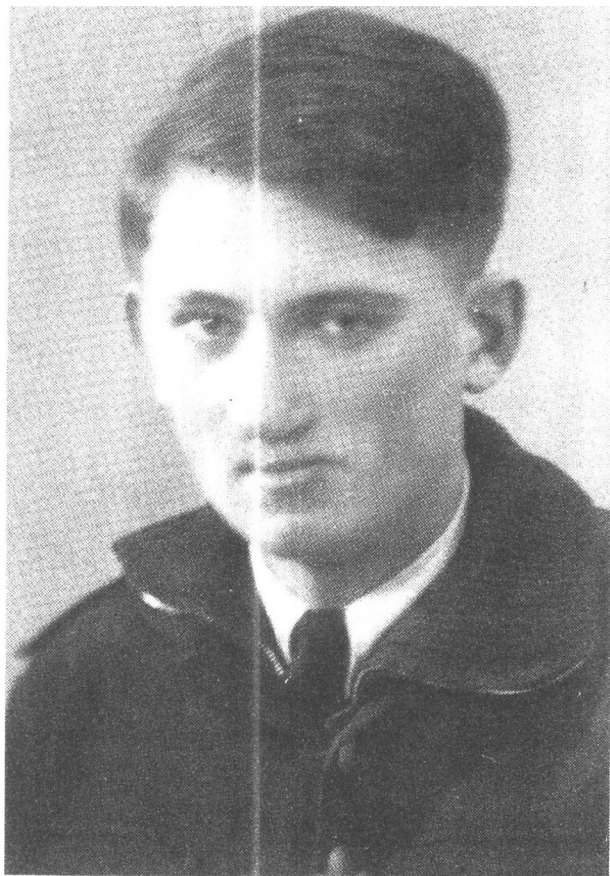
M. 哈：在这个十年的开端，发生了两件特别令人关注和不安的戏剧性事件。第一件，也是离我们较近的事件，是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在东欧所发生的剧变。它几乎把苏联推到了内战的边缘，但同时却在 1990 年 10 月，给我们德国人送来了两德统一的礼物。它不仅对我们，而且对整个欧洲的国家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一件是由伊拉克 1990 年 8 月吞并科威特引起的，这一行动招致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最后通牒，进而转化为以华盛顿为首的盟军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从而引发了一场六星期战争，不仅给中东人民，而且给工业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后果。

海湾战争

—— 一种新的德意志正常性的催化剂

Diablogue



1942 年的哈贝马斯

M. 哈：在这次书面采访中，我想首先探讨一下波斯湾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在全球引起了激烈的讨论。许多人认为，这场战争是一次难以想象的向野蛮的倒退。或者，它是为了防止更坏的事情发生而采取的迫不得已的措施(Ultimaratio)?

J. 哈 这是一个在 1991 年 1 月和 2 月，给人们带来情感冲击的问题。它使人困惑，产生的效果犹如一颗炸弹在人们头脑里爆炸，仅这场争论的激烈程度便耐人寻味。海湾战争为何会引发如此强烈的情感震撼？其实，1945 年以来世界上爆发了数百次战争，其中有些甚至造成了重大伤亡，但它们中的大多数在第一世界并未引起普遍关注。当然，这一次情况有点不同，它关系到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工业生产赖以生存的中东石油资源。可是，这并不能完全解释公众的激烈反应。一个超级大国发动的战争，在一定程度总会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按理说，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引起的反应应该同样强烈才是，因为对越南的干涉在严格意义上，的确是一次发生在世界公众眼前的冲突。不过这一次不再是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一场民族解放斗争，其中有两件事改变了人们对战争的知觉方式，因而特别值得注意 对战争进程的理性谋划，传播媒体史无前例的在场。

由于在越南的惨痛失败绝不能重演，而“国内战线”必须保持稳定，于是，冷静规划、精确计算的总参谋部在对一切严加控制的同时，还要让公众观察到战争的全过程。作为命运较量、被偶然性所主宰的传统战争，于是转

变为一种‘人造现实’，变成了一种风险极低、然而技术上高效的‘清洁’的指挥艺术，一场迅速、精确、己方付出极小‘血的代价’的战争。关于战争的报道也受到严格控制，甚至成了战争的一部分，与在电视屏幕上虚拟出来的所谓战场现实融为一体。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苦难现实的一切都被隐讳，都被赋予了一种人为的性质。这场‘被模拟的’战争的全过程好似在播放一盘录像带，犹如一个电子程序在令人眼花缭乱、无法抗拒地展开。与人们的预期相反，即使在战争结束以后，真实情况也决不会通过新闻媒体被曝光。伤亡数字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谜，人们不得不猜测，究竟是十万、二十万还是更多。我读到的惟一真实报道，是关于在迟迟未能实现的停火到来之前，在从科威特向巴士拉逃亡的路上发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剧。这一则小小的真实报道在一位英国记者的笔下，几乎像三十年战争^①的重演。

当然，新闻媒体也在无意中起了作用。作为受众，我们心里很清楚，战争的真实情况必须向我们隐瞒——即使是我们的想像力，也是被虚拟出来的。每当我读到有关特拉维夫遭到飞毛腿导弹袭击，关于巴格达在一天之内遭到两千架次飞机空袭的报道，我总是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日子里我们遭到的轰炸，想起我们被摧毁的城市。电视屏幕上的黑洞激发了我们的想像力。此外，

^①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发生在1618—1648年。这场战争使德国的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同时进一步加深了德国的政治分裂。——译者注

它也把感到受了愚弄的观众的失望目光引向了媒体自身。拒绝将这样的负片曝光的做法增加了公众的紧张情绪，展示了媒体的强大，展示了 24 小时不停运转的媒体无所不在的在场。总而言之，我们对事件的知觉，不但被虚拟出来的事件，而且也被事件、新闻报道和大众接受的同步性所决定。在我们眼前出现的，是一台用高科技武装起来的战争机器那可以在瞬间将一切碾得粉碎的履带——经过无害化处理，抹去了体验和苦难的阴影，并涂上了一层人道的色彩。这不仅仅是一种异化了的现实，人们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印象：改变了的知觉方式创造了另外一种现实。军事力量的不对称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偶然性起决定作用的战争进程变得似乎可以由人来主宰。

这一切可能带来长远的危险后果，即是说，它打消了人们心中的恐惧，而这种恐惧绝非多余：下一枚飞毛腿导弹可能携带化学弹头，萨达姆可能会实践他用生物武器或装备生物武器的恐怖主义实施报复的威胁，战争双方可能会使用核武器。ABC 武器的幽灵恰恰隐藏在被纵火焚烧的油井的背后。一场战争造成一次生态灾难，这还是头一次。确切地说，这就是高科技带来的、似乎尚很遥远的巨大风险正步步逼近，并开始威胁人类的事实，与那种有效地炮制出来、赋予战争过程以新的质量的精密筹划之间的差异。至于可能摧毁生活世界的基础的一切，则似乎令人安心地在生活世界的视野里得到了恢复。您刚才所说的向野蛮的倒退，那也许是对我们透过 CNN 的

有色眼镜看到的東西的一種有點過時的形容罷了。人們對這類經過抽象化的事件的知覺愈是被操縱，愈是破碎，其道德情感便愈是被左右，他們的想像力便愈是會被延伸到戰爭的政治維度的解釋所控制。

M. 哈：您所說的海灣戰爭的“政治維度”指的是什麼？

J. 哈：我們的知覺从一开始就被某些範疇和清晰度不同的分析所駕馭。大家爭論不休，每個人似乎都有一點道理。許多看法之所以過激和片面，是因為在多次討論中，人們未能在以下四個層面清楚地看到這場戰爭帶來的後果。

第一個層面，即強權政治的層面，我剛才已經提到了，這是顯而易見的。毫無疑問，工業國家擔心失去對原油這一性命攸關的能源的控制權。其次，對中東殖民時代的記憶，使這場衝突染上了技術上占優勢并統治着世界市場的西方基督教文化與阿拉伯世界之間對抗的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範圍內的非殖民化進程即使我們這一方，也增強了對文化上曾受到威脅和剝奪的民族敏感。我們懂得了，宗教社會化導致的對立，比不同生產方式或階級差異造成的裂痕更深。戰爭的第三個層面是由於薩達姆·侯賽因威脅要用 ABC 武器打擊以色列而引起的，涉及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由來已久的衝突。即使從歷史心理的角度來看，一場毒氣戰對於這一次處於被動態勢的以色列來說，也是無法忍

受的。它的存在还从未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而将德国向伊拉克的技术出口与针对以色列的、可能携带化学弹头的飞毛腿导弹恶意地联系起来，对于德国人的政治道德来说，无疑是一次严重的挑战。米沙·布鲁姆利克 (Micha Brumlik) 曾用“酸碱度测试”(Lackmus-Test) 来形容它。战争的第四个层面但愿有利于世界的未来，这就是联合国在世界内政方面所起的作用，正是它授予了盟军以军事干预的权力。当然，这一授权是有条件的。

人们不能轻易地忽略这场战争在国际法方面带来的问题。不论是信奉马克思还是赞同卡尔·施密特 (Carl Schmitt) 的现实政治家，都持此种观点。在他们看来，在利益面前，思想是无能为力的。我以为，这种看法在一个生活机遇的分配极端不公平的世界社会是非现实的。在权力和财富分配方面的南北鸿沟和东西差距，使讹诈和丧失理智的以 ABC 武器相威胁的行为，包括自我毁灭的生态恐怖主义威胁，越来越频繁。正因为如此，加强联合国的权威，使民族共同体的决议在必要时亦可以通过军事手段得到贯彻，是合乎情理的。联合国宪章的第七章已经规定，联合国可以采取此种由它所指挥的军事行动。冷战结束后，我们应该强化联合国的作用，建立一个能有效地采取法律所赋予的一切可能措施的执行机构。

M. 哈：您关于建立一个联合国执行机构的想法或许会遭到许多联合国观察家的反对，他们会说，您过高地估计了联合国的作用，而这个组织实际上是受安理会内部

的权力状况制约的。

J. 哈：请别把我的主张同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混为一谈，也别将它与联合国的权力垄断——这在目前完全是不现实的——混淆起来。康德在他论‘永久和平’的著作中，同样拒绝了一个世界政府的构想，而与此同时，却建议成立一个“自由国家联盟”。当初，设立安理会机构的目的在于以这种方式将世界大国吸纳进来，从而为联合国打下基础。没有它们的合作意愿，一个国际组织将像迄今为止的联合国一样软弱无力。只有在强大的工业国家出于内部原因，对外越来越放弃好战政策的前提下，世界和平的秩序才可能维持。康德早就指出，惟有在内部实行共和制宪法的国家，才能联合为一个和平秩序的同盟。而我们则希望，生活在福利国家民主制度之下的人民，能逐步过渡到一种自由的政治文化，适应自由的体制，大多数人养成一种爱好和平的素质，使传统方式的战争再也无法动员起来。尽管我们看到，19 世纪的民族主义情绪有重新抬头的危险，但长远趋势却朝着这一方向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看，海湾战争具有两面性。它不是一场在联合国指挥下的战争，参战国甚至没有义务向联合国报告战争的进展。但尽管这样，盟军自始至终是获得了联合国授权的，在理论上是作为这个世界组织的委托者而采取行动的。这总比什么也没有好。假如我们明白，国际法的履行必须事先得到国家共同体，而不是一个贬义的、乌托邦的世界政府的有组织的合作，那么，我们至

少可以把两极世界秩序的终结，理解为一个新的开端的契机，人们事后至少可以要求，从海湾战争中吸取教训，将它变成一件好事，一件不仅对中东地区，而且对于整个国际关系秩序有利的事。我正是这样来理解我国联邦总理最近的表态的。倘若着眼于未来，对迄今为止的实践持怀疑态度是毫无道理的。不可否认，仔细追究起来，除了朝鲜战争开了一个值得怀疑的先例，西方大国至今并未进行过军事干预，即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坚决反对联合国的有关决议。然而，苏联的剧变带来了一种新的局面，两个超级大国第一次出现了某种一致。美国及其盟国第一次在客观上有机会暂时充当一支今天尚不存在的、理论上中立的联合国警察部队的角色，从而以集体维护科威特被侵犯的自卫权的形式来捍卫国际法的原则。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的行径，以及扬言要对以色列发动战争，甚至一场使用 ABC 武器的战争的威胁，违反了国际法。

M. 哈 然而，1991 年元月 16 日到 3 月 3 日的海湾战争，绝不能视为一次联合国的警察行动。

J. 哈 当然，联合国的授权不过是一个借口。但它也构成了这场战争的一个因素，考虑到国际政治的未来发展，我们应该特别关注这一变化。人们至少应该大力呼吁切实贯彻某些大国用作借口的那些原则。我刚才说过，这场战争至多只是一把双刃剑。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次警察行动，并且一步步失去控制，演化为一个国家间

的常规战争。有人指责联合国变成了美国的工具。即使是这样的指责,也主张维护国际法的准则,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它。在对战争进行规范评估时,人们应该首先想到联合国授权所施加的限制。这不仅仅涉及战争的目的,获得联合国授权的大国首先必须将他们所代理的角色与它们自身的利益区别开来,作为西方工业国,它们显然试图谋取这些利益。必须避免三种情况的发生:干预必须世界范围内作为警察行动而得到普遍支持,决不能演变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常规战争;其次,决不能让人怀疑,西方是为了争夺能源基地才采取这次行动的,即是说,不能引起用鲜血换石油的嫌疑 最后,必须采取预防措施,避免这场地区战争被误认为是西方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文化冲突。

M. 哈:在海湾战争的开始阶段,曾经出现过许多幼稚的、甚至是愚蠢的反战口号,但与此同时,也有人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看法。作为例子,我想提一提下面两种观点 第一,美国,但首先是联合国秘书长,放弃了通过谈判化解冲突的努力,或至少尝试这样做的努力。与此相反,他们利用夸大了的数字,大肆渲染萨达姆·侯赛因的军事威胁。此外,最后通牒中命令萨达姆·侯赛因在规定时间内撤出科威特的要求,对于一个阿拉伯统治者来说,简直是无法接受的。第二,有人指责,西方世界在最后通牒到期之前,放弃了敦促以色列政府同意举行一次中东和平会议的努力。而召开这样一次和平会议,在当

时是一条解决中东危机的可行的途径，关系到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他们声称，正是战争的爆发使这种可能性化为乌有，使西方国家在阿拉伯人眼里变得比以前更加不可信任。

J. 哈：您说得完全正确。在盟军实际使用联合国的授权，向伊拉克发动进攻之前，您所列举的条件必须得到满足——竭尽一切可能促成谈判的举行，对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进行负责任的评估，对战争中所使用的手段做出适当的限制。事后对这样一场野蛮的事件进行吹毛求疵的规范性评价也许有点迂腐。目前，全世界都在讨论一些存在争论的问题和观点（对伊拉克的）长期封锁是否有效 不同文化模式之间相互理解的困难 达成一种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安排，在击败伊拉克之后是否比这之前更加容易，如此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现在仍未取得新的突破。

M. 哈：对海湾战争的第三点指责大意如下：联合国的军事干涉也许是必要的，但美国的空中打击——地毯式轰炸，彻底摧毁多座城市如巴士拉等等——造成了伊拉克平民的大量伤亡，尤其是摧毁了自然生存环境，因此，帮助科威特获得解放的军事行动，最终变成了一场针对伊拉克的毁灭性战争。这样一来，海湾战争也就严重违反了适度性这一国际法准则 战争的目的，即科威特的解放，与此种无法挽回的破坏不成比例。这表明，美国人对这场战争所作的辩护用国际法来衡量，是不能成立

的 总而言之,即使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来衡量,西方国家也是在用新的非正义来反击萨达姆·侯赛因的非正义。对于以上或类似的指责,您认为是否有道理?

J. 哈:战争的适度性问题——地毯式轰炸,数以十万计平民的伤亡,巨大的难民潮和大量无家可归者,民用基础设施的严重破坏,长期的生态后果,伊拉克还有科威特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灾难性状况——显然是应当考虑的。但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考虑到它被整个阿拉伯世界所包围,在最野蛮武器的威胁下而遭受的恐惧,我想,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惩罚的决定也是正当的。即使是为了贯彻这一决定而必须满足的条件确实得到了满足,我们也必须明白,从道义和法律的观点看,战争的适度性只能通过一次行动来检验,这一行动旨在运用警察手段,即目标明确的手段,使国际共同体的决议得到尊重。人们总是充当事后诸葛亮,而这就是历史事件的本质。

M. 哈:在西方国家,许多人把萨达姆·侯赛因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将他妖魔化。美国及其盟国则运用各种手段,试图推翻他所领导的政权,使伊拉克彻底“西方化”。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①在海湾战争进行的第三周,在一篇发表于《明镜》周刊(1991年第6期)的文章中,把萨达姆说成是一个“战争狂人”,形容为“当代的希特勒”。他认为此人将他的全部热情、全部怨恨、全部信

^①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1929—),德国诗人、散文作家。——译者注

仰都投入到反对西方的事业中。“一切在意识形态上对他进行解释或反驳的尝试”都将失败,因为“他的事业并非受思想,而是受顽固的反西方念头来推动的”,而这种疯狂的念头终于在 1991 年春天得到了制止。对此种说法,您有何评论?

J. 哈:您真是步步紧逼。我始终认为恩岑斯贝格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杰出、最聪明的人。但是,他的政治嗅觉并不怎么敏锐。他是一位有时要试探一下,一个发疯的论点会激起怎样反应的知识分子。德国和伊拉克,一方是凡尔赛条约之后与共和国历来关系紧张的市民阶层,另一方则是经历了一场与伊朗的 8 年战争后消耗殆尽的伊拉克人民;这里有德意志的民族偏见,那里则有什叶派的原教旨主义:在受屈辱民族——正是它们的死亡冲动孕育了独裁者——的遗传基因中,哪有什么历史的可比性?在用人类学观点看待一切的目光下,倘若跌入了后历史的陷阱,那么,一切明显的差别都消失了。另外,从希特勒的研究史中,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将领袖人物妖魔化,往往会歪曲历史事实。我们不能将恩岑斯贝格视为历史学家或政治分析家,而应把他看做一只地震仪。他对一切事情都感兴趣,可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写任何文章,只不过,写出来的东西大多有点平庸罢了。假如他现在对战争发表某种议论,那大概是因为他一时心血来潮,情绪发生了变化吧,或许,由拥护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转而赞同德国后现代主义者波勒尔 (Bohrer) 了?

在《法兰克福汇报》的散文版,政治精英们关于新的国际责任,关于统一后的德国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正常性的呓语,遭到了对立面的反击。在这里,社论写作者们关于德国人逃避政治、在战争带来的生存威胁面前麻木不仁的抱怨,在文学理论的层面上得到继续。为此,他们竭力让克莱斯特^①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如果对政治悲剧完全无动于衷,还能够生存下去吗?对民族统一所带来的幸福的沾沾自喜,曾在失业大军的阴影下变得黯然失色。而现在,这种论调在被电子科技驾驭的钢铁暴风雨的美学假象中,又变换了颜色:“统一使民族重新获得了国家象征的语汇,它现在本应第一次用这种语言说话,可惜的是,它却保持了沉默,并且不得不替这场战争掏腰包。”^②英雄与商人,强悍的沙漠之狐与软弱的平民形象再一次被对立起来。二战后的德国人宁愿掏腰包也不愿去死,不是伸长脖子等待挨宰,而是大发感慨。倘若我们认真对待这种喧嚣一时的抱怨,我们便中了 1914 年用早期浪漫派的行头装扮起来的、现在又复活了的思想的奸计。

我不得不承认,从早晨 6 点到 9 点的不知疲倦的电视报道中,我获得的惟一条好消息,是一则关于在土耳其的德国空军基地举行军中弥撒的新闻。指挥官禁止摄制组在弥撒进行过程中拍摄,因为士兵们忍不住要流

^①克莱斯特 (Heinrich von Kleist, 1777—1811), 德国戏剧家、小说家 —— 译者注

^② 《法兰克福汇报》1991 年 2 月 18 日。

泪。伤感并不是浪漫派最坏的遗产。

M. 哈 关于德国人的特殊作用,我们下面再讨论。让我们暂时回到中东战争的话题上来。萨达姆·侯赛因显然是因为敢于与自以为是、一贯傲慢自大的西方世界对抗,才会在阿拉伯世界,甚至第三世界赢得如此多的支持的。“他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挺直腰板走路”,苏丹的一位政府代表在战争进行到第三周时说。按照这种观点,西方世界以其傲慢无理的西方中心的政策,首先挑起了这场冲突,而这场风暴后来却刮向了它自己。您怎样评价我们这一方应该承担的责任?

J. 哈:您所指出的那种现象——阿拉伯民众及其伊斯兰世界面对西方的殖民主义霸道重新找回自尊的愿望,而这一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并不会消失。这也使以色列的地位变得很尴尬,因为,它在这一地区扮演着西方桥头堡的角色。这场战争带来的一个出人意料的后果,可能是伊朗势力的加强和原教旨主义的扩张。假如我们把宗教原教旨主义理解为对社会现代化的反动,对合理生活形式的摧毁和对人民实行的文化禁锢,那么,西方帝国主义在这方面所应承担的历史罪责是不可否认的。现代化毕竟曾经是并仍将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形式。然而,这一地区的本土精英们,也应该对日益加剧的物质贫困和政治压迫承担责任,不管他们是否实行集权统治,是否腐败——大家都是同谋。此种依赖性愈强,人们对文化冲突的意识便愈是明